

中央宣传部批转《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1983〕43号，批转科学院党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近来中央领导同志重视和提倡编修新志和整理旧志的工作。各省、市、县委宣传部应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责成有关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订好规划，建立和健全精干的机构，配备好人员，抓紧开展这一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志指导小组要切实对各省、市、县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现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你们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落实，做好地方志的编写出版工作。

中央宣传部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中央宣传部：

遵照今年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原中国地方志小组改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重建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已于今年四日正式成立。

自1980年胡乔木同志倡议新编地方志以来，为时不过三年左右，许多省、市、自治区积极响应，新修地方志的工作发展得比较快。据7月份的统计，现有17个省和自治区、84个城市和1070个县，先后建立了地方志编纂机构，并开始了修志工作。预计在“六五”计划期间，约有五十部城市志、上百部县志可以出版，五部县志和武汉市志的部分专志可以问世。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全国修志工作发展不平衡，许多省、市、县的修志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尚有不少地方迄今尚未建立机构，在机构改革中，有少数修志机构和人员出现动荡不安的新情况。

今年四、五月间，我们召开了全国地志规划会议，又分别召开了省志、城市志和县志的专题座谈会。各地代表一致认为，新编地方志不仅有助于地方的经济建设，而且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思想建设事业。为了加强地方志的编纂和出版工作，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一) 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凡未建立修志机构的，希望尽快地建立起来；已经建立修志机构的，要结合地方的机构改革，使之逐步健全起来。

修志专业机构应短小精干，如何设置由地方党委决定。编修地方志的专业人员，必须具有

3504

一定的专业知识、编辑经验和写作能力，并应吸收当地离休、退休的老干部和老专家参加指导。

(二) 新编地方志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文选》是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的结果，所有参加修志工作的同志要认真学习，以提高政治思想理论水平，使新编地方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充分反映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

(三) 编修地方志一定要重视保密工作。中央和国务院有明文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遵守。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机密，尤其是涉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均不得载入志书。鉴于国际情报斗争尖锐复杂，为了防止泄密，新方志暂限于内部发行，严格控制印数。

(四) 地方志编辑定稿之后，必须经过审批手续。省、市、县志经各级编纂委员会审定后，凡涉及党的方针、政策、涉外等重大问题，必须报请省、市委批准，县志或相当县的市志须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凡涉及保密范围的问题，须经地方各级保密委员会审核。

(五) 地方志的出版问题，由各地方自行负责解决，省、市、自治区宣传部统筹安排。

新编地方志是一项新兴的文化建设事业，需要获得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各地社会科学院(所)、出版局(或出版社)、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其它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本地区的地方志工作。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清举人李文科事略

周叔平

李文科字青云，资中走马场人。家世业农，生活贫苦。李幼年读书茅屋中，室内农具纷陈，无容膝之隙地，乃自动于屋后设斋，编茅为壁，开一小窗，大可六寸许，光线射入，仅照及一书之宽而已。以小凳为桌，文房四宝，不精而备。稍长从塾师读，甚勤奋，塾中月课数题，规定用八股文法写文，李不能作。师曰：“送我一斗酒，为你作一题。”李惊惧归告母，母欣然以纺织所得零钱沽斗酒奉塾师，师一饮而尽，援笔成文。李在旁注视，不期月亦能完成月课命题之文，其才思之敏捷可知矣。

李于光绪戊子科考中举人，进京会试不售，乃肄业于京师之南学。南学藏书甚富，浩如烟海，经史子集，四库并罗。李研读数年，学业大进，学宗史汉，文习韩苏，俱有深造焉。

李由京返资历任本州及威远各书院讲席。辛丑年，补泸州九性乡训导。特别在任资州珠江书院讲席时，全国废科举，兴学校之风气渐开，李除旧布新，勇于建树。有王炳南者来资，李多令院中诸生，从彼学习算数，以为他日出洋留学之计。劝告院生朱子朝勿习八股

文，勉令至省垣学算术。李《送朱子朝游学序》：“曰西人不可及也，夫不可及遂终不学耶？学之而不及，不愈于不及而不学耶！况学之而未必不及之也。”又“专门之业，宜于中国者法之，制造之器械，利于中国者购置之，习其数矣，又得其意，得其意矣，又会其神，中国之大，四万万心思材力之富，熔铸数十年之久，或有驾彼法而上者。”李认为西人所精者格致也（格致指自然科学）算学为格致之初基，浅而易学者也。李之所见，在资州当时文教界中（特别是老学究）赞同者还不多。

时校中（书院已改为学校）以三年为期，聘有日本人名川彦作教英文，教学质量欠佳，学生收获不大，而其薪水特高，超各科任何教师，名川三年约满，将回日本，以重金购得“赵子昂画马图”一幅。李大为不满，作诗曰：“人为王孙喜（王孙指赵子昂）我为王孙悲。手迹安得入三岛，我歌一曲马不知。”李爱惜祖国宝贵文物，不应落入外人之手之深意可见也。

庚子联军侵犯京师，清政府媚外屈膝，顺敌意，令全国残杀反教反帝义和团，资中义和团被杀者亦甚多。李至为愤怒，有“神拳”诗记其事：“揭竿四起纷扰乱，教徒（指基督教徒）莫敢擅其锋。当道奉檄痛施劓骈首就戮无戚容。老夫（李本人）屡向有司说，有司特此为首功。杀人如麻血殷地，有田不治荒春农。”

珠江书院改为学校后，李联任院长，校长垂二十年，生徒从习文史者甚众，桃李满门，群仰山斗，称其文，乐颂其德，学校亦以文化教育斐然可观，而名噪蜀中。

李晚年自号仓原叟，知交好友敦请将其诗文辑为八卷，编入《仓原集》付印行世。

清进士郭灿事略

周叔平

郭灿，字梓楠，资中陈家场人。少年家贫，笃志好学，稍长为文，气势雄厚。应州试时，资州牧高培谷（贵州贵筑人，任州牧前后十二年）延蜀中名士杨锐、范溶、胡廷等襄助试事，皆奇其文。省试梓楠以第一名考上秀才，资人羡之。高州牧下车之始，仿成都尊经书院创办艺风讲舍于资城北关外，提倡经、史、政治、性理、文章之学，购置图书二万余卷，敦聘宋育仁（字芸子）吴之英两大师先后主讲舍教席。梓楠与弟爌（字化南）及爌（字景南）同游学讲舍，学业大进，旋弟兄三人得高州牧推荐同调尊经书院肄业，资人无不啧啧称羡，号郭氏三杰。

癸巳秋，梓楠中举人，甲午春联捷成进士，殿试二甲，以主事分刑部任用，庚子，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梓楠离京返资，以道员分发云南。时满员锡良督滇，委梓楠办理保甲，襄助治安得宜，继办巡警，民不扰而布置肃然。锡良异其能，委滇省禁烟总办。云南为鸦片烟藪，吸烟者甚众，不易禁。梓楠勤为劝告，不以法而以诚，察苗则亲历幽险僻境，不任左右，惧苛索累民。民众感悟，自赴署缴烟枪者以数万计。锡良大惊，立升为云南提学使（清代学使为长驻官，管全省教育；主考为临时官，管全省举子考试。）

梓楠在学院任中，尽力饬州县兴学外，于迤西成立夷学，回民成立回民学，夷回向外，

乱乃靖。迤东属边陲，又瘠苦，历届道尹鲜有至者，梓楠毅然至迤东境，各族人民夹道而观，欢声雷动，老人们慨然叹息今日见汉官威仪。梓楠在滇有惠政，各族人民讴歌称道之声，不绝于耳。

辛亥革命后，宋芸子（富顺人，清翰林学士）以修四川省志邀梓楠至成都助理编辑，时梓楠已年逾七旬，以宋师之意难违，带病至任所，以劳瘁卒。

清季外任官吏，多以压榨小民博大吏欢心为能事，而梓楠以贫寒士子由甲科任显秩久，两弟一举人，一明经，俱登政教仕途。然弟兄身后，家无余财，环堵萧然，无锦绣之设，无金玉之饰，既勤奋为学，又廉洁敦品，难兄难弟，有为有守，郭氏三杰之称不虚也。

著名川剧艺人——蒲松年

温玉坡原稿 王志行整理

“生前教养子孙徒弟，献身于人民；

死后当有千百万人，改造新社会”。

“粉墨学侏儒，寓庄于谐，貌似丑而心田颇美；

衣冠如优孟，真假作真，身虽死而品格长存。”

前面是两副悼念川剧名艺人蒲松年的挽联。前一联是中共内江市委郭克赠送，后一联是内江市文联敬挽。两联可说是总结了蒲松年从事川剧艺术的一生，以丑启美，品格长存，是非常贴切的评价。

蒲松年（1871—1952），本名蒲祥，原籍双流县陈家场，贫农家庭，生于清同治10年（辛未年）。家有一兄一姊。姊夫姓翟，是个巫师（或称端公）。蒲从小就受姊夫的影响，耳濡目染，学唱端公班酬神的还愿戏。姊夫曾教他扮演过送米的安安和背韦陀的江流，受到赞赏。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爱好戏曲事业的种子。

蒲祥到了12岁，父母要他在家帮做农活，不许他再跟姊夫一起混。但他已爱上了戏曲事业，就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姊夫和附近的端公都不敢收留。他听说新津县纯阳观在唱庙会戏，于是，就偷跑到了新津。

“戴一顶檐毡帽，穿一领签零零，挂绺绺的破袄……呼儿哈哈！到晚来乐陶陶，醉眠古庙！”

台上正在演《化子拾金》，把个蒲祥看得津津有味。戏刚唱完，他就爬到后台去看“叫化子”卸装，又跟着“叫化子”来到对面黄鹤楼茶馆外面，学唱刚才的一段戏。顿时引起了“叫化子”的注意，站起来一看，却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叫化子”就竖起大拇指说：“娃娃要得！操得出来！跟我当徒弟！”蒲祥一听，心花怒放，立刻叫声：“师父！”跪下磕头。

在旧社会，“戏班子”俗称“下九流”，最被人轻贱。正当蒲祥站起身来，跟着师父想离开时，突然，一个“八字胡”走过来，“啪！啪！”，对着蒲祥就是两耳光，骂道：“你丧我蒲氏门中先人的德！”回头又对“叫化子”说：“岳老板！我蒲氏子孙永远不学你那门道，我是蒲家的族长。”

这样，蒲祥被族长抓回了祠堂“跪香”。族长又通知各房执事公前来开会，要拿蒲祥和他爹一起“正家法”。蒲祥就趁等人的机会翻墙逃跑了。当族长发觉，派人四处寻找，他已不知去向。族长无法，只得在新津、双流一带张贴“撵字”：“戏子优伶，永世不准归宗！”

蒲祥从祠堂里逃出来，流落到了仁寿，靠帮人背包包糊口。但他仍四处打听唱戏的，一心想找到师父。一天，他遇到一个姓陈的裁缝，是资中北门外状元街人。陈裁缝见他聪明伶俐，有心想成全他，就对他说：“资阳在唱城隍戏，上坝下河的好先生都在。你帮我背包包，我带你去找师父！”于是，蒲祥跟着陈裁缝来到了资中。原来，裁缝有个女儿和他一样大，想他长大后招为门婿，有个后靠。

但是，蒲祥仍一心想唱戏，裁缝家的温暖并没有把他留住。他听说“云南唱川戏最吃香！”就跟着云南挑山货帮的脚子，帮他们“挑加班”来到了云南昭通。那时候，昭通还没有专业川剧班子，只有唱“围鼓”的，他也去参加坐唱。后来，昭通成立了“四川同乡会”，“围鼓”也就发展成了专业戏班。

1889年（光绪15年，己丑），18岁的蒲祥在昭通“蜀音茶园”正式登台，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在昭通，川戏虽然很吃香，但他觉得自己功夫很差，演戏期间，从没有放弃寻师学艺的决心。他曾先后在叙府、泸州、内江一带寻找，都未找到，只得先回资中，与陈裁缝的女儿结了婚。结婚不到一个月，打听到师傅的下落，他不惜抛别新婚燕尔的妻子，直奔大邑，终于，邛崃的一个乡场上找到了岳春师父。

从此，蒲祥跟着岳春，精心学习川剧艺术，夏练“三伏”冬练“数九”寒暑不辍，异常勤奋。三年时间，基本上学得了岳春的艺术精髓，能够演出《活捉》、《滚灯》、《坠马》、《扫秦》、《上山》、《献剑》、《拾金》等许多高难度的功夫戏，成为资阳河一带的著名丑角，定居资中状元街。

虽然蒲祥已经成了名角，但在旧社会，艺人是被人践踏和玩赏的工具，毫无政治地位。1911年，蒲祥被部队拉去作了役。一天晚上，他和其他役兵杀死了看守兵逃跑出来，不敢再回资中，又直奔云南昭通，搭班唱戏，并改名为松年，以避追捕。5年以后，在他45岁时，听说资中的妻子已经死亡，才又娶苗族姑娘王素贞作为继室。王在两年以后，生了个孩子在取名为信学。

1924年蒲在昭通度过了十三个年头。在他53岁时，因思念家乡，就挈妻携子回到资中状元街居住，送子上学。他自己则在资、内、成、渝和四川其他各地演出，直到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内江县新艺川剧团（即现内江市川剧团前身）。他被选为第一任团委主任。那时，他已是80高龄。在剧团排演《白毛女》时，他主动要求扮演杨白劳，并由何丽卿扮演喜儿。由于他俩人在旧社会都受过凌辱，演出逼真，亲切感人。八十的杨白劳给内江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51年12月，西南地区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召开时，他被选为特邀代表赶赴重庆参加，由于旅途劳顿，到会就病倒了，会议特派贾培之、张德成、刘奎官、魏香廷、傅心一、王天恣等六位老艺人为代表，携带鲜花点心前往探望。会议结束，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留他在重庆治病。他不同意，坚持要回内江，于1952年正月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蒲松年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人民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在这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亲身感受了封建官僚和军阀统治对人民的压榨和造成的灾难。他对帝国主义和旧社会充满了仇恨，对祖国和新社会凝结了满腔

的热爱之情。民国十八年，当刘湘和刘文辉内江时，他演昆曲《化子拾金》，把范郎出场的四句诗唱为：

“国难民贫唤奈何，叔侄阅墙起风波。

疮痍满目心愤郁，抒怀但唱莲花落。”

抗日战争时期，在一次为抗日将士募寒捐衣的义演会上，他又演《拾金》，把范郎的出场诗又改为：

“芦沟桥前起烽火，为驱倭寇动干戈。

前方将士衣单薄，募捐且唱莲花落。”

当范郎从雪堆里拾得黄金一块，唱到〔要孩儿〕第二支，他突然捧着黄金走到戏台旁边，“通扑”一声，把金块投进了募捐箱。当场观众掌声雷动。大家纷纷拥到台前，取下戒指、耳环，或掏出现金送进募捐箱去。

在蒲松年身上，充满了对军阀、恶霸等反动派的反抗精神。幼年时代，他反抗过族长的迫害；中年，他与恶霸作过斗争（见《戏剧与电影》1983年12期《蒲松年智斗金蛇蛋》）；晚年，他做梦也在想为徒弟报仇。他有个女弟子，名叫李小钟，因受反动兵痞的污辱，愤而吞鸦片自杀。蒲倒在床上痛哭了一夜。恍惚间，他听得外面鞭炮连天，有人喊：“李闯王进城了！”出门一看，一队义军押着一群兵痞过来，一刀一个，把那些兵痞砍倒在地。他痛快极了，哈哈大笑，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

蒲松年一生，倾注了对川剧事业的全部心血。对于艺术，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舞台上认真严肃，寓庄于谐，以求振奋发聩，教愚化顽。他擅长唱丑角，但为人光明磊落，品德高尚。对于川剧艺术，生、旦、净、末，以及唱、做、念、打无一不懂，样样在行。1951年，为了向徒孙们传授传统艺术，他与“四季葱”在内部合演《活捉三郎》，场内虽无观众，但他一样严肃认真。当魂旦将三郎提起时，80岁的老艺人双手提靴摇晃，飞起褶子，宛如双脚腾空。后面青彩裤笼着双脚，以脚尖着地，用蹴步和滑步，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摇荡飞舞，作空中游魂状，使人惊叹不已！由此可见他艺术造诣之深。

晚年，他致力于教导川剧后代，朝夕诲人，孜孜不倦。三十年代川剧名旦之一的“四季葱”（聂丽君）、“霓裳影”（黄建宗）、赖祥麟、舒成章，以及女弟子姚艺新，周金钟等都出其门下，为川剧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此外，他对中国人民文化落后也有切身感受。因此，不论他怎样四处奔波，却把儿子留在家里，用自己血汗挣来的钱，节衣缩食；为儿子创造安定的学习环境，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虽然儿子对他不够谅解，他也从不计较，一心以事业为重，为川剧贡献了一生！

所以，当蒲松年死后，党和人民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和荣誉，本文开头的两副挽联就足以说明。此外，如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部长任白戈，重庆市文联剧协，以及他的门生，弟子都送有挽联。在他出殡的那天，许多人自动地集合到送葬队伍的后面，纷纷以沉痛的心情和这一代名伶告别！

资中的婚姻习俗

叶 博 夫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资中县男婚女嫁的习俗，其手续和我国古代婚姻成立的手续差不多，即需要完成“六礼”的程序。

“六礼”即：一纳采（送礼求婚）；二问名（询问女方名字和出生日期）；三纳吉（送礼订婚）；四应征（送聘礼）；五请期（议定婚期）；六亲迎（新郎亲自迎娶）。这六礼的名目初见于《礼记·昏义》，具体内容载于《仪礼·士昏礼》。其后，《唐律》、《明律》中都有类似的规定记载。六礼以男方付给女方的身价为主要特征，是旧礼教下变相买卖婚姻的具体表现。

纳采（送礼求婚）的手续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下，大致是这样：父母为了给儿子求婚，先作些访问，遇有“门当户对”的某家淑女，即请求亲戚或朋友而与女方父母熟识者前往女家，向其父母送礼，叙说为男方某子弟求婚之事。男方主动求婚，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女方父母了解到某家的子弟好，认为“门当户对”，求人向男方父母叙说求婚之事。还有一种情况是与男女双方都有一定关系的热心人为男女双方撮合者。这一般都是出于好心，想做成一件好事的。也有那惯媒婆把女方说得如花似玉，品貌双全，赛过天仙，把男方说得才如子建，貌似潘安，以此撮合者其目的在于获得重金的酬谢，而不是真想办成一件好事的。因此，致使男女双方婚后不睦者，亦大有人在。

经过纳采的第一步程序，如果双方基本同意，即进行第二步的程序：问名。

问名是由媒人向女方父母询问女子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再开具两方“八字帖”和男女双方父母交换。所谓“八字”，这本是旧中国迷信的一种。认为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各有天干地支相配，每项用两个字（比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之类）代替，四项就有八个字，即可推断一个人的命运。订婚前须交换“八字贴”，也叫“庚贴”，简称为“八字”。双方父母把这“八字贴”和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的“八字贴”拿去请“八字先生”（迷信职业者）推算一番，看有无相克之处，如果八字没有克父克母、克夫（或妻）克子的情况，再把八字帖放在神龛上，经过三天的时间，看家中有没有人发生病痛，或牲畜死亡，或打烂碗盏等情，如果没有，这是诸事顺遂的好兆头。也有合水婚的搞法。即把男女双方的庚贴分别放在两个碟子内，把碟子漂浮在水缸里的两边，第二天再看两个碟子的距离是远还是近。如果距离甚远，就认为这是命中注定不合，如果距离甚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相合，也是好兆头。这之后就进行第三步程序：纳吉。

纳吉——送礼订婚，也叫做“扎八字”。由双方父母和媒人，及其他至亲好友，由男方摆宴设酒，正式确定关系。所以这在一般人家都是相当隆重的。这之后，如果男的因病死亡，女的本“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或父母无人奉养而自誓不再嫁，守节以终者，往往而有之，这叫“望门寡”。如果女的死亡，男的另娶了，但与原配女方家庭仍保持亲戚关系，认其父母为父母，认其兄弟为舅，逢年过节，或父母寿诞，过从甚密者，亦往往有之。这就无

怪其订婚仪节之隆重了。还有指腹为婚，五福之内侄女随姑——近亲通婚的习俗。“五四”运动后的新式订婚，则要填写“订婚书”，男女各执一份，要交换信物（一般是戒指），婚后再交换回来。

订婚之后是“应征”，即送聘礼，这是第四个程序。男方送什么、送多少，这事也要借重媒人，勾通双方意见。一般都是送钱，因为一般的女方都希望得到这笔钱，以便把女儿的嫁装、陪奁办得体面些。

应征之后，就进行第五个程序：请期——议定婚期。经媒人勾通双方意见之后，就把结婚日期确定下来。结婚要选择良辰吉日，不能用红沙日子，据迷信说法那是不吉利的。婚期一般都定在半年或一年以后，这样双方都才有一个比较充裕的准备时间。有钱人家如果要请客，要大排筵宴，在婚期之前就要给客人送大红贴子。这帖子的内容如下：

谨订于某年某月某日为小儿某某结婚敬备菲酌
候光

某某某双福（或“全福”。“双福”就是请夫妇老俩口；“全福”就是请全家老少。）

某某某谨订
某年某月某日

这帖子用红纸写好后装入红纸做的封内，封面上写“请柬”二字。如果不摆酒宴，不请客，也须送“辞帖”。辞帖内容如下：

兹因小儿某某结婚无力治酌谨
谢

某某某敬启
某年某月某日

最后一个程序是亲迎——新郎亲自迎娶。不过资中县的习俗，新郎亲自迎娶的很少。这个结婚的终身大喜事，一般男女双方都要尽自己的力量办得尽可能的体面。有钱人家前前后后要搞一个星期。比如订于某月初十结婚，男方预先雇请的厨厨师（民间专为人家办酒席的厨师）在初八就到家来，杀上两三条肥猪。因为初九“过礼”要把一条杀好的猪送往女家。初九这一天，富豪人家张灯结采，所有门楣贴上喜对（一般人家不能张灯结采，也要贴喜对）。喜对大致是以下的一些：

幸有香车迎淑女
愧无旨酒宴佳宾

笙箫奏凤凰
鼓乐迎佳宾

百年歌好合
五世卜其昌

香掩芙蓉帐
烛辉锦绣帏

且看淑女成佳妇
从此奇男是丈夫

琴韵谱成同梦语
 灯花笑对含羞人
 欢庆此日成佳偶
 且喜今朝结良缘
 缕结同心日丽屏间孔雀
 莲开并蒂影摇池上鸳鸯
 海枯石烂同心永结
 地阔天高比翼齐飞
 白首齐眉鸳鸯比翼
 青阳启瑞桃李同心

横额不外下面这些：

燕尔新婚	百年佳偶	花好月圆
佳偶天成	珠联璧合	五世其昌
六礼告成	鸾凤和鸣	笙磬同偕
天作之合	福缘鸳鸯	龙腾凤翔

初九这天吃过早饭，男家由一个老成可靠的人和媒人率领，叫人抬上几个“抬盒”（这抬盒就是一个大竹篮，盒底面积约有现在的一个写字台面那么大），装上各种礼品、“三水师”——蒜苗三根、柏桠一束、镜子一面，送往女家，这叫做“过礼”。这队伍人数之多少不定。行走的顺序大致是由两个打大锣的人走在最前面，接着是火炮（即鞭炮）手，以下依次是媒人、仪仗队（由几个十三、四岁的儿童，把从吹鼓手那里拿来的儿面红、黄、绿、蓝各色旗子，用竹竿挑上的队伍）、四人抬的花轿、吹鼓手、抬“抬盒”的人，最后是搬运嫁奁的郎客若干人。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走成单行，起码有两百米长。如果女家距男家三、四十里路程，那么吃了早饭就得出发。打大锣的打打走走，走走打打。有“么二三”的打法，有“么二三带回转”的打法。“么二三”的打法是：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所谓“回转”是把顺序颠倒过来，即“三二么”的打法。吹鼓手也是吹吹走走，走走吹吹，一路上十分热闹。走到能看见女方家屋时，火炮手就放起鞭炮来，有的还用三眼炮（也叫铁铳）放起来，吹鼓手这时更要使劲地吹打。女方家则热情接待，首先把“三水师”接进堂屋去放在神龛上供起来，据说不如此，将会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对吹鼓手则给他们安排一席特别座位，让他们去尽情地吹打。这就是过礼的全过程。

女方家庭在初九以前也忙着准备。结婚女子先要请有经验的人“开脸”——在脸上淡淡地抹一层熟石灰，再用白色棉线把脸上的毫毛全部绞掉，然后才涂脂抹粉。这一天女家是最忙的，既要招待自家客人，又要接待来自男方的客郎。初十这天，吃过早饭，新娘子自是凤冠霞帔（男方送去的），在家人的簇拥下进堂屋（供家神的屋子）去拜别天地、祖宗、父母、兄弟姐妹、亲友，然后上花轿。结婚本是一桩喜事，但在那旧礼教之下，这一出嫁之后，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从一而终”，就是别一家的人了，以后回娘家也就是客人了，至于这婚姻是否美满，将来是福是祸，未可预料。所以在和一家人辞别之时，仍不免哭哭啼啼。

新娘上花轿启程，这叫做“出阁”，得有新娘的兄嫂陪送，谓之送亲，或叫送嫁。有兄无嫂者，兄送；兄嫂俱无者，弟送；兄弟俱无，或弟弟年幼，有叔叔送的，也有祖父母送的。总之要知书识礼，或有一官半职的体面人物送亲，才免至失言失礼而贻人笑柄。这个迎亲的队伍与前一天的阵势稍有不同。即在媒人之后是撑拦伞的，之后是新娘的花轿，花轿之后是送亲人的轿子。那新娘的陪嫁物品很特别，要一只由男方送去的公鸡，配上一只母鸡，装在笼里，把笼绑在花轿后面，叫做随轿鸡，还要鹅一对，鸭一对。另外，穷家小户起码是单铺单罩（蚊帐），有钱人家是双铺双罩，或四铺四罩，乃至八铺八罩。还有大小脚盆、大小水桶、大小凳子，衣柜、衣箱、桌椅、碗盏、茶壶等等。大地主有以地方为女儿陪嫁者，书香之家有以书籍，如《曾文正公家书》、字典、《辞源》为女儿陪嫁者。多或少，这要由女方的经济是否富裕来决定。这些陪奁抬着一路上全要亮出来，以示体面。那花轿里还有个讲究——放一些糕点，一个编得极精致的烘笼，烘笼里装上带火种的草木灰。据说这叫做“带粮带火”。但这灰在半路上休息时，要由送亲人在花轿前后倒去一半，这不知是为啥。这是闺女出嫁的气派，如果是嫁二嫁的，就只能在夜间出门坐小轿（二人抬的），既不能敲锣打鼓，更不能扯旗放炮。据说那是因为她违反了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被视为不守节、不光采的人。

在男方家里自然是备酒办席，迎宾待客，忙得不亦乐乎！花轿快到家时，早有人飞报而来。这时新郎就赶紧爬到楼上去，或在堂屋里神龛前站在高凳上，或全家站在高处。据说这样居高临下，将来才不至被女人欺压——当“矮耳朵”。这时屋外铁铳三声，统、统、统地响；鞭炮噼哩啪啦地放，男女众宾客都涌出门来迎接。两队吹鼓手，迎亲的、坐镇的一齐噼哩哇啦地吹打，鞭炮声、喧闹声，轰隆隆震天价响，好不热闹。

花轿临门了。在进门之前乡里人有个习惯，要由一人（或者就是新郎本人）提着燃放的鞭炮绕花轿三遍。——这或许就是古代掳掠结婚时，把女子抢来后，男子的示威或自鸣得意的遗风吧。但乡里人说是为了避邪。因为新娘先是别家人，怕有别的邪神邪鬼附在她的身边。

花轿抬进门来，轿门向着堂屋，停放在院坝里。这时要由男家的小辈给新娘献茶，新娘要给一两个铜板的赏钱。抬盒里的东西捡出来放在一个米筛里，再把这米筛空出来放在轿门前。这时厨倌师便来在轿门前，手抓一把米、豆、盐、茶（茶叶）的混合物，向花轿撒去，再向前后左右四方撒，口中念念有词。这叫做“回车马”。然后杀一只雄鸡，将鸡血绕花轿周围地上淋一遍，再去新房里淋一遍，据说这也为的是避邪。这种封建迷信的玩艺儿在整个婚嫁的过程中是很多的，其实不过是些迷信职业者借以骗人钱财的鬼把戏而已。

有的还要行一次拜轿的手续，即由新郎（或男家的小辈）向着轿门行三叩首的跪拜礼。据说拜了之后新娘才肯出轿来。新娘对于这拜轿是要预备拜轿钱的，在她出轿之前，要先把拜轿钱抛出来。这或许是母权时代的遗孑，男子要向女子低头，女子要给男子以给养。

堂屋内神龛前横放两张方桌，系上桌帏，铺上桌布，陈放着供品。由家祖、外祖（或家叔、娘舅）之有德望者去把一对大红蜡烛点燃，这叫做“发烛”。桌前地下则铺以红色地毯（这是富贵人家的气派，一般人家是铺两领草席），由有阅历的长辈指引新郎在那红毡的边缘上，由左踏去，一步一步地踏它一周。据说这叫做“脚踏四四方，年年买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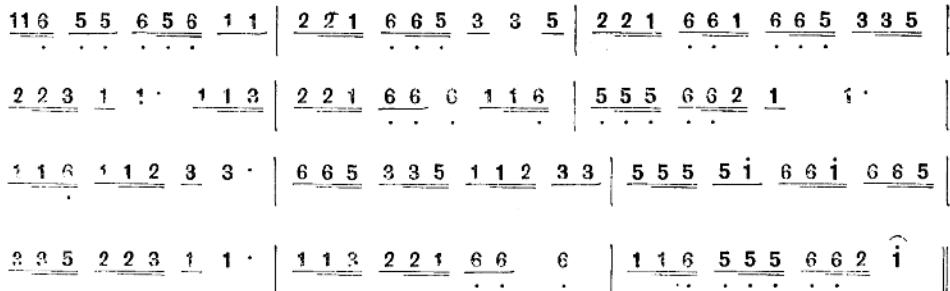
花轿是用重重的装饰帏幕围得水泄不通的，拜轿之后，由年高有德、多子多福的老婆婆（按即傧相）前去打开轿门，搀出新娘来，让她踩米筛而过（据说这是踩“四眼人”——怀孕妇女。因为四眼人摸过新娘的东西，新娘以后生下的孩子多病痛难于抚养），缓步进入堂屋。开始“拜堂”了，赞礼的人（司仪人）高呼：拜天地，新郎新娘转过身来，向堂屋外拜三拜（跪拜礼），再转过身去，拜祖宗。然后依次拜家祖、外祖，拜父母，拜家叔，拜娘舅，

拜姑父母，拜兄嫂，拜姐夫、姐姐。总之，凡对长辈都是拜拜拜，受拜的每人都要赏赏赏地丢拜钱，有的还要给新人上“红”，而且要说“祝新郎新娘百头偕老，多子多福”之类的好话。此后就是“倒拜”了。这时小弟妹、侄男侄女来拜新郎新娘，新郎新娘要给小辈以赏钱。如果男的是续弦，前妻遗有小儿女，新娘是娶过来填房的，小儿女前来倒拜，也要给他们的赏钱。其次是夫妻相对交拜。这一交拜过后夫妻之道便算成立了。这自然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在神前结婚的遗习。古时的所谓神就是生殖器，所谓神前结婚就是在神前交媾。交媾过后自然男的便成为女的的人，女的便成为男的的人。但其后人文进化，多费手续，由交媾变相而为交拜（此说详《沫若文集》第六卷《黑猫》和《沫若文集》第十四卷《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最后是拜“红叶”（当着面是不称“媒人”的）。拜完之后是入洞房。这入洞房的一幕很有趣。分明是白天，新郎一只手要掌着一盏烛，一只手牵着新娘盖头的纱帕。不用说新郎在前面走，蒙头盖面的新娘是由傧相及众宾客簇拥着跟在后面。这情景使人想到掳掠结婚时代的复活。那蒙头盖面的新娘被新郎牵着，不正是才由异族得来的女俘虏吗？结婚的寝室叫作“洞”房，进“洞”房时白天都要点烛，那不也表示着一种穴居野处的遗习吗？

由纳采至此，“六礼告成”。

“五四”运动以后，自由恋爱的新式结婚，虽然还是拜拜拜，但只不过由三叩首的跪拜礼改变为三鞠躬礼而已。

在拜堂的整个过程中，吹鼓手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卖力地贯彻始终地吹打，奏的是细乐，那曲调据吹鼓手说叫做“小开门”。演奏时以竹笛为主，再配以小型的打击乐器如“二心”之类。旋律简单，节奏轻快、活泼。其曲谱如下：



吹鼓手将这一曲调反复地吹奏，直到拜堂结束才能休息一会。这时已到中午，众宾客稍事休息，便入席开宴。先是吃茶吃糖果。陪送亲客坐席，很有点明堂。如果送亲客是新娘的长辈，这就得请年高德劭、知书识礼的人去陪，以免失言失礼，开罪客人而贻笑大方。如果送亲客是年轻人，也可以派年轻人去陪。这些年轻人是会与送亲客开点小玩笑的。送亲照例是要吃大油果子的，茶点上席每人都有一个的，可有人却趁大家说说笑笑之际，先自拿掉一个。当大家动手时，陪客的倒一人抓了一个大油果子，送亲客反而没抓到。大家吃着，却让送亲客出洋相。这种事在陪送亲客的场合中，常常有之。

茶点吃过后是吃酒。下酒菜先是四荤四素的八个碟子，接着上炒菜，若干碗炒菜之后，上大菜。所谓大菜即指蒸菜，亦即今之所谓咸扣肉、甜扣肉、清蒸的全鸡全鸭，或海菜之类。吹鼓手当然同时入席，可在吃酒之始，要奏“小开门”。之后，上大菜也要停箸奏“小开门”。当然这是中产以上人家才有这番讲究，一般小户人家却简单得多。在即将上大菜时，主人要从最尊贵的一席开始，依次去各席给客人敬酒，要这样说：“承众位厚情厚

礼，没有什么菜，请列位多喝一杯素酒！”客人们报以“谢谢了！”当此时，酒席间自然是觥筹交错，谈笑风生；有的则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有的却是酒醉肉饱，胡言乱语，忘乎其形，自取羞辱。

在客人们大多下席之际，那大门外的一群告化子（他们是头一天就来过的），由告化头把大家凑钱买来的一串“九连灯”（九个大火炮，若干小火炮）啦嘣哩嘣地放一通，接着唱一段“莲花落”。内容不外是祝主人家人财两发，祝新郎新娘百头偕老、早生贵子之类的吉利话。唱完还大声喊道：“恭喜主人家，讨碗喜酒吃啊！”紧接着众告化子们又一齐呐喊：“恭喜主人家，讨碗喜酒吃啊！”这时，如果是阔气的主人，走出来先赏每人二百文铜钱，再叫人提出一大壶酒和两桶“折窝子”（从各席收集来的残汤剩菜）来，他们用自己的碗，斟上一大碗酒，轮流着喝。告化头用汤瓢把折窝子分给大家吃。虽是折窝子，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酒足之后，还是要上一两碗大菜的，把主人家提出来的两大桶饭，各自狼吞虎咽，尽肚子装，吃不完的，还可以拿走。但在吃酒吃肉的全过程中，他们还是井然有序，很守礼节。如有不守规矩，甚至乱套滋事者，由告化头先打之而后开除，从此不许其入伙。

晚饭照样摆酒宴。饮酒之间，由父母率领新郎新娘依尊卑长幼次序去到各席，与客人一一介绍，并由新郎新娘向客人敬酒。晚饭后才开始闹新房。这闹房的事也是有板有眼的。新房内家具的摆设，由专人负责。新床由多子多福的妇女去铺陈。对这些人新婚夫妇要“挂红”（用红纸包着钱相谢）。新郎新娘并坐在床沿上，或同坐在一张条凳上，男女众宾客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除祖父母、父母不参加闹房，其余的人，不论长辈、平辈、小辈，不分老少，都可以去闹房。开始是由长辈发问：“新贵人请问新姑娘，在家姓什么？叫什么名字？贵庚（年龄）几何？排行第几？”接着新郎开言，把刚才的问话一字不漏地重复一遍。以后又问：在家有些什么人？在家做些什么事？读过书没有？读的什么书？在家会不会挑花绣朵？这些枕套、罩帘、床单是谁绣的？自己绣的又是谁教的？父母教你些什么？……这一开了头后，人人都可以发问，新娘须做到有问必答。每一次发问，开头都必须冠以“新贵人请问新姑娘”这样的话。大致开头还比较文明、严肃，到后来诙谐、逗乐的话就多起来。还有些庸俗不堪入耳之言。人们还要细看新娘的耳朵和手，有无子耳朵，是否骈指。一定要闹到深更半夜，闹得大家都不亦乐乎，才肯罢休。结束前，长辈一定得说一番好话，仍不外先前那些“百首偕老、早生贵子、多子多福”之类的老调。最后一个节目是请送亲的人来交钥匙。因为箱箱柜柜都是用锁锁上的，而钥匙却在送亲的人手中。有那贪钱的小舅子交钥匙一把一把地交，交一把，新郎要给一次赏钱，否则他不肯全交出来。有的新郎开始赏钱很慷慨，但这样一次次地赏，到后来虽倾囊以赏犹不足远甚，以至弄得彼此尴尬，哭笑不得，不欢而散，甚至新娘被气得逃走者，民间亦偶有所闻。大家走出新房后，房内还要放一串鞭炮，弄得洞房内乌烟障气。新郎新娘处此情此境，不亦苦乎！“五四”运动以后，较为新式的闹房，已不再用“新贵人请问新姑娘”那一套封建的老玩艺儿，而是首先请他们讲恋爱经过，再就是叫一同唱歌或跳舞之类，当然，到最后，那些“好话”还是要说一通的。

第二天早饭后，客人先后散去。临别时主人还得送谢礼。一般要送新娘亲手绣制的一对枕套，或一双鞋面，或手巾以及其他物品。送多送少，视客人地位之尊卑而区别对待。对媒人则特备谢礼相送，除枕套之类以外，更用红纸封裹着钱，面上写着“谢仪”二字，谓之“挂红”，以表敬重和感谢。

新婚夫妇三天以后，男方备办种种礼物，由新娘偕新郎去回门。回得门去照例是要拜女方的天地、祖先、岳父母以及其他长辈。女家在那一天特别热闹，就如男家迎接新娘的那

一天一样。先前是男方看新娘，这回可是女方看新女婿。女方得请那德高望重、知书识礼的人作陪，不管是清要闲谈，还是品茗饮酒，随时随地陪着，不得有差池。这陪客人于谈话中要替主人探知其品行才学。对这年轻人有不懂的事体，还得适时地巧妙地给以教育。

以后这对年轻夫妇生了孩子，还有一个“倒媒树”的仪程。这就是男方备办礼物、谢仪送给媒人。至此，媒人才算不负所托，不虚此一番奔波之苦与唇舌之劳。

资中全县有110多万人口，除极少数苗族和回族之外，主要是汉族。这些汉族有川省人，有清初大量迁移来川的福建人、广东人、湖广（湖北、湖南）人，还有江西老俵。这些人男婚女嫁的“六礼”的程序基本上是相同的，只在风俗习惯上有些不同之处，然而大都不外是一些封建迷信的玩艺儿，这里就不再分别赘述了。

包办买卖的制度，大讲排场的虚荣，铺张浪费的恶习，繁文缛礼的仪式，封建迷信的作弄，多子多累的苦楚，这就是旧中国的资中县人婚嫁习俗的简要概括。如此陈规陋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多少寒微人家也明知其习俗不好，然而欲罢不能，而且不少人好象在暗暗地互相竞争、比赛，遂至愈演愈烈。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所以，自“五四”运动以后，有识之士也曾试图改革，然而谈何容易，亦徒唤奈何。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提倡婚姻自主、简化手续和仪式，号召节约，婚事新办，反对封建迷信，提倡计划生育、少生优生，《婚姻法》明文规定近亲不能结婚。三十年来，在社会上自然是颇见成效。但是父母包办的、变相的买卖婚姻，办婚事铺张浪费以及其他的一些恶风陋俗，并未彻底根除。今后要建立文明的婚嫁习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尚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努力。

资中县解放前的工业状况(二)

陈 星 南

(四)煤炭工业：据县志载：“煤，名石炭，又名乌金。”《正字通》谓：“即西北所烧之煤，今资（中）西所产最称繁盛。故民间络绎不绝，炭户乘其值贱，载货他境，如简阳诸城市，滨河干者皆资以为用。”民国廿五年（1936）以前，我县尚无正规煤厂出现。只有四乡群众，用手工挖掘，自产自销而已。

民国廿五年（1936）三月有县人杨德三在县属双河乡塘口地方筹办“荣福厂”，有资本国币1200元，职工30人，月产原煤15000市斤。供应附近群众燃烧之用。此为资中有正式煤厂开办的第一家（据县府档案294卷）。

民国廿六年（1937）五月杨德三又在双河乡之青杠坪开办“三义煤厂”。有工人3人，月产原煤（烟煤）1000市斤。

民国廿七年（1938）十一月十六日有威远人华栋之，在县属宋家乡熊家桥地方设厂，合资经营“华丰煤矿”，有股金13万元（国币），职工566人，月产原煤900吨。矿区面积达13公顷49公亩5公分。该矿于次年（1939）十月七日经四川省政府正式批准，发给川字324号开业执照。此为我县煤矿业较具规模之大型企业。1942年因洪水淹没，被迫停工。1944年又在旧井附近，另掘新井，重行开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3月，经县人民政府检查，因

设备简陋，工人安全无保障，命令其停工。

民国廿九年（1940）一月县人唐晏浜在双河乡红牌坊地方开办“玉丰煤矿”，有资金1000元（国币），工人8人，月产原煤6000市斤，属小煤窑性质。

民国卅二年（1943）初，先后有五家小煤窑开办，资本额均不大，人员亦少。计王逐驹在白庙乡、楠子堰、杉树弯；徐海门在凤至乡的五马坝、迴龙庵、蓝家坝；张笃亲在宋家铺的斜龙、大坟坝；夏咏雩在宋家乡的磨子塘、桅杆坝、油草堰；张华三在白庙乡的上河坝、石角弯、小三角堰塘等地陆续办起小煤厂。

总计在建国前资中全县有案可查，经政府批准开业的共有九家，其中以“华丰煤矿”为最大。有工人最高达到700人，平均月产原煤一千吨。其余散布四乡的小煤窑，因未纳入登记范围，听其自生自灭，当时政府亦未置理。

我县原煤蕴藏量及其地层位置，解放前无正式勘探记录。建国后（1959）县矿治局曾派员随同西南煤田地质勘探普查队，作过一次地质勘探。据载：我县所产原煤，均为烟煤。煤地构造上属中生代侏罗纪香溪煤系，一般为薄煤层，厚约30—70公分。分布于县境内西南面之水南、真理、球溪、公民等区，而以公民区为主产区。总藏量为7803万吨。因属重点探勘，若全面普查，恐不止此。

（五）制盐工业：资中产盐，由来已久。据《续修资州志》载：“蜀盐井肇自秦太守李冰，察识水脉，穿广都盐井为凿山开井之权舆。汉，武阳陵井最著（《井研志》）。”又载：“资中故产盐。”《总志》载：“唐时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井四百六十。”宋梓州路资州九十四井（《元和志》）。银山县有盐井十一（《九域志》）。磬石县有盐井十八（《旧志》）。（按银山、磬石两县即今资中县属银山镇、重龙镇）。《旧州志》载：“明（资中）原额有罗泉、跳石、金李、陈福、渊潭五井，俱在县西七十里内，先年井坍丁逃。”

上述说明资中在宋朝时即有盐井九十四井，再加上银山、磬石廿九井，则资中共有盐井123井。到清康熙元年（1662）又渐恢复，开淘“左脚”、“顺塘”二井。五年（1666）顺塘井坍。清雍正十年（1732）仅存井八十二眼。共征课银一百六十八两。乾隆年间，选添井眼，增加水引二百一十八张；陆引二千九百二十七张，共征银一千五百三十九两六钱四厘八毫。

民国十八年（1929）《续修资州志》载：“资州罗泉井古厂也，创于秦（见《盐法志》）沿两汉而晋而唐而宋而元明，其间盛衰不一。到明末苦矿税敲剥下，遭流寇（农民起义）蹂躏，井厂停废有自来也。”“迨清雍正八年（1730）始开复原额，于时课井二百三十七眼。”两年后到雍正十年，课井只有八十二眼了。雍正八年时，“部颁水陆引三千一百四十五张、运销资州、资阳、仁寿三县七十余场”。（见《盐法志》及《盐务辑要》）。“咸（丰）道（光）以来，课井枯老，政府允准井商开凿帮井，以济其衰。逐渐加凿，因之井灶（又渐）发达，远盛于昔，一时附厂贫民，胥赖此为生”。至“同（治）光（绪）年间，井数已达一千二百余眼”。这是旧中国资中产盐的极盛时期。

民国成立以后，最初几年，由于“军阀混战，盐法混乱”，资中盐又“被富（顺）盐侵销，致资中厂商亏折，逐渐停井”。至民国十八年（1929）只“存井六百八十一眼”。

资中产盐区域主要集中于县属罗泉井、金李井等地。罗泉厂自雍正八年（1730）始设盐铺分州，以董其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间，盐法虽有变更，然盐务归分州管理，则仍如前。清光绪三年（1877）川督丁文诚奏请开办票厘，特设委员，于是盐厂有专官之设，不由分州兼理自此为始。到民国十九年（1930）罗泉井年产盐二百万市斤，有井八

百二十八眼。金李井产五十万市斤，有井一百一十四眼。

罗泉盐质优良，其品种分巴盐、精盐、花盐三种。就中以巴、精盐为最佳，花盐质次之。盖巴盐结于锅底，经火锻炼，其卤已尽。故前清川督丁文诚誉为“味美质甘”之佳品。民国四年（1915）盐务署盛赞资中所产盐质为“甘咸味浓”。特别是精盐，其质雪白，成结晶体。经盐运使署提验，嘉奖其优质，特准予提价出售。各地锁售市场，亦乐于购食。可见物质改良，为群众所欢迎。

资中盐税源起，据《续修资州志》载：“罗（泉）厂自雍正八年（1730）开复，由户部颁引。水引每张配盐五十包，征课银三两四钱五厘；陆引每张配盐四包，征课银二钱七分二厘四毫。引限一年，过期取消，往返折阅，行商裹脚。”乾隆中叶，改票由行商代销，每斤征铜钱一文五毫。同治元年（1862）川督骆秉章奏请：“除富（顺）荣（县）改归收盐纳税外，其他各地，概由灶绅包纳。”但实行以后“流弊滋多，受害靡已”。到光绪三年（1877）川督丁保桢奏请“开办官运，改设票厘。每斤征税三文，迨后，迭次有加”。加了多少，加了几次，不得而知。但到清末，罗泉盐每斤征收正厘已达十五文五毫了。这是我县盐业征税到清末时梗概。

民国三年（1914）一月“奉令改资州为资中县，改罗泉井分知事为县佐，改征课收为征收局。

民国四年（1915）一月“盐运使令：改盐厂为盐场，设罗泉井盐场知事，专司盐运兼负缉私”。

民国十四年（1925）据资中县参议会档案载：“罗泉的盐于民国十四年（1925）陈列巴黎世界展览会，品居世界第一。化验结果，纯盐占百分之九十九有奇”。本区盐业据《蜀中广记》载：“创始于秦，至宋而极盛，逮明末虽毁于流贼（农民起义）。然到清雍正八年（1730）又渐恢复，计历二千余年。”

民国卅二年（1943）十月起国民党政府公布“盐业专卖暂行条例”，私人不得经营贩运。直到民国卅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始改为自由贩运，取消公卖店设置。资中县于同年十一月起，取消食盐专卖，并于十二月六日以建字第388号训令转知各乡镇，“现准人民自由购销食盐通令饬知”。

民国卅六年（1947）十月十日，资中成立“制盐同业工会”，选举韩燮阳为主任委员，潘瑞炳等十一人为委员，共有会员88家。

民国卅八年（1949）国民党政府彻底崩溃，这年资中盐业仅存私营七十八家，有职工696人，其中职员156人。生产方式，纯为土法，用牛牵引，汲水煮盐。产量最高年为1936年，共生产食盐45050担（每担为百市斤）。到1949年总产量只有24473担（据资中盐场管理处上报材料）。

（六）石油工业：我县并无专井提炼，乃罗泉盐井在汲取盐水时，附带搜集者。每日可得100—200市斤。据民国廿四年（1935）陈敦儒在《开发四川石油之研究》中称：“早在民国十一年（1922）即有盐商韩雨霖携油到成都与陈商议制油办法，后因法令所限，人民不得自由兴办而中止。”直到民国廿四年（1935）资中县长汪泳龙秉承上级命令，提倡生产救国，才指派建设科长陈润民和工程师陈次静组织“资兴石油公司”，由政府出面正式开办。石油公司厂址设罗泉镇之禹王宫内，每日只将各盐井之副产物搜集提炼。据该公司报告称：

“每百斤原油，可制成汽油、煤油各一桶（十加仑），柴油50市斤，共值洋20元。”开办经费由建设经费中拨出大洋二千元解决。为不湮灭前人辛劳，特将《开发四川石油之研究》有关资中罗泉石油资料摘录如下：

1、矿区分布和储量：“以罗泉为中心，东南长约20华里，西北广约七至八华里。产油最多地点以邵家坝、俞家沟、陈家湾等处为最丰。”又称：“此地石油，过去或由盐井汲取，产量无常，普通日产二、三百斤。依据美国槐特氏之估计法，可供全川五十年之用。”

2、油质及蒸馏试验：据“资兴石油公司”报告载：“罗泉油质优良，川中为第一，世界上并无其匹敌。”此说疑窦较多。解放后省地质队在资中各地均有勘探，迄今未见利用，可见储量不大。该报告又称：“此处油质共有三种，依其轻重，分为一、二、三号用示区别所含分量。”计：

1号：含汽油74%，煤油13%，柴油13%。

2号：含汽油23%，煤油37%，柴油40%。

3号：含汽油无，煤油33%，柴油67%。

以上均按一百加仑计算。

蒸馏试验结果：油色：绿黄色透明。臭气：无不快臭。比重：薄氏36度。引火点：九度。

分馏试验结果（蒸馏量200立毫，馏出时间30分钟，馏出温度104度）：

馏油种别	馏油量	百分率
挥发油	21立毫	10.5%
灯油	96立毫	48%
重油	82立毫	41%
损失	1立毫	0.5%
合计	200立毫	100%

资中县府成立之“资兴石油公司”仅三月余，因资金不足，无力继续开办而告终。

(七) 纺织工业：资中纺织业由于原料(棉纱)不足，从民国六年(1917)四月起才有一家威远人郭汉卿开设的“裕丰布厂”成立。主要生产各种土棉布(白布、色布、斜纹布、条格花布、毯子布)和洗澡巾、面巾等。厂址设城关北门外，有职工41人，木制布机26台，资本额国币一千元，独资经营，经理郭汉卿。平均年产土布二千匹，面巾三百打(每打12张)。行销仁寿、荣县、威远及资中各地。该厂产品为民生日用所需，价低而耐用，很受群众欢迎。到民国廿七年(1938)该厂向政府登记时，职工已减到29人，产量缩减为一千一百匹，面巾却增加为五百打。由于棉纱是外来(重庆)，当时交通不便，时告缺乏，故织布机大部未开工。

解放后该厂由国营百货公司向其加工订货，产量、人员均有增加，并发展机制手工棉线，供应城乡广大缝纫业和居民需要。其领导关系一直由手工业联社、二轻工业局领导。

(八) 裕丰电灯厂：该厂于民国廿四年(1935)五月成立。它的前身是在当时驻资中军阀师长王治易授意下，由官绅合夥组成“资中电灯厂”。机器来源，购自自流井盐场作推盐水用的国产旧瓦斯机(煤汽机)一台和向泸州购买旧发电机一台组成。嗣以防区变更，机器损坏而停业。(见裕丰厂向资中县府所写接收报告)。

民国廿四年(1935)资中县长汪泳龙因提倡市政建设，必须开办电灯厂，以改善城关照明而利繁荣。才由王兰波出面独资经营。自任经理，其侄王辅仁任厂长兼技术员，技师王师鲁。下设工程、业务、会计三部。一面接收旧设备；一面增添新设备。于当年五月份正式发电。有职工8人，资金一万五千元(国币)。(系民国廿七年填报数)。到民国卅二年(1943)又增资为十万元，职工14人，厂址设正东街禹王宫庙内。有电灯六百盏。主要设备

为25马力和20马力煤气机各一台，13.5瓩和12瓩直流发电机各一台。

解放后，1950年5月17日由县人民政府没收。人民政府派郑时金、韩祥兴负责，归人民政府工商科领导。1958年成立工业局，改由工业局领导。1964年划归农机局管理。1967年由川南电业局统一管理。（待续）

资州园林产贡柑

——资中柑桔源流简述

柑桔是我国南方的主要水果，也是果中佳品。它的色、香、味都很好，汁多爽口，是人们喜吃的优良营养品之一。西晋周处的《风土志》说“柑桔之属，滋味甘美特异者也”。苏东坡《浣溪沙·咏桔》词：“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花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李纲《食桔》诗也有“黄金为肤百玉瓢，沆瀣深贮甘且芳。雕盘初擘喷清露，冰齿乍嚼流琼浆。色香气味纷可喜，下视众果皆茫茫。”的名句。

柑桔营养丰富，经济价值也高。据商业部科技局资料，四川红桔和甜橙（广柑）的主要化学成分：

红桔含水分87%，果糖1.48%，葡萄糖0.66%，蔗糖4.53%，柠檬酸0.7~1%，蛋白质0.9%，每100克可食部分含维生素C 16毫克，钙26毫克，磷15毫克，铁0.2毫克，纤维素0.4克；红桔皮中含芳香油1.9~2.5%。

甜橙含水分89%，果糖1.32%，葡萄糖1.13%，蔗糖3.24%，柠檬酸1~1.5%，蛋白质0.7%，每100克含维生素C 50~54毫克，钙41毫克，磷19毫克，铁0.5毫克，纤维素0.6克；甜橙皮中含芳香油1.5~2%。

此外，柑桔中还含有柑桔甙、腊质、酶和1%的脂肪，0.4%的灰分以及色素。每吨柑桔有果皮200公斤左右，可提取果胶6公斤上下。柑桔种子中含甘油脂35%，可作提炼香精的原料。

柑桔在我国文献记载中较早的有：《尚书·禹贡》录述了当时扬州和荆州均产桔、柚，且是贡品。《周礼·冬官》有“桔寄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的记述。又《吕氏春秋》提到“江蒲之桔。”还有《史记》“蜀汉江陵千树桔，其人与千户侯等。”的叙述。西汉谏议大夫资中人王褒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在《僮约》篇中有“种植……三丈一树，八尺为行，果类柑从，纵横相当。”的记叙。《唐书·地理志》云：“资州土贡柑”。《元和志》亦云：“资州贡柑子”。州、县志则有“红桔尤盛，不逊于资阳”的说法。我国最早的一部专写柑桔的著作是宋朝韩彦直的《桔录》；它也是世界第一部柑桔专著，对保鲜贮藏经验已总结甚详。注

上列史料证明：我国栽培柑桔，可上溯至夏朝，已有四千年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文献记载。进入汉代，种桔子已是致富之道。我在西汉时期便初步掌握了种桔子的窝行距园艺，迄于唐代，本地桔子已成进贡的名品了。

据民国三十二年官修的《四川省资中县概况》记载：全县柑桔民国三十年产量250万市斤，输出柑桔5500市担，畅销省内各县及云、贵、陕、甘、两湖等地。